

(供内部参考)

岸

尤里·邦达列夫著



岸

〔苏联〕尤里·邦达列夫 著
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岸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48,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7

1978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8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 · 2624 定 价 1.58 元

前 言

《岸》的作者尤里·邦达列夫是一个紧跟苏修统治集团的作家。五十年代中后期，正当赫鲁晓夫大肆鼓吹“三和”时，他写出了反映所谓“战壕真理”的中篇小说《营请求火力支援》（1957年）和描写“火线爱情”的中篇小说《最后的炮轰》（1959年）。一九六二年，正当赫鲁晓夫再次攻击斯大林时，他就发表了反斯大林的长篇小说《寂静》；六十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在国内外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政治路线，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侵犯我珍宝岛后，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热雪》（1969年）以及他和库尔加诺夫等人合写的电影剧本《解放》（1970年）也就相继出现，歪曲苏联卫国战争历史，竭力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制造舆论，深得苏修叛徒集团头子的欢心。勃列日涅夫甚至在苏共二十五大上说到：“战争的参加者与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一道，仿佛又一次沿着前线道路上的热雪行进。”电影剧本《解放》也被授予列宁奖金。

长篇小说《岸》出现在苏修文坛上也绝非偶然孤立的现象。它的构思和出现都是由苏修叛徒集团的政治需要所决定的。一九七一年，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召开苏共二十四大，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和平纲领”，妄图在“缓和”、“国际安全”、“友好合作”的幌子下，加剧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也就在这一年，邦达列夫开始构思小说《岸》。随着苏修不断加速扩军、争

霸，“缓和”的风也越刮越紧。邦达列夫紧密配合，正好在一九七五年，当欧安会最后在赫尔辛基签订文件前夕，发表了长篇小说《岸》。

这部小说一发表，便受到苏修多方重视，数月内就有《星火》、《我们同时代人》、《小说月报》三家杂志竞相登载，评论界也赞扬这是“一部非常富有现代性的作品”，因为它宣扬了“进步人类正在热切探索和寻求缓和途径”，因此在今天“缓和与和平共处的条件下，显得十分重要而有价值”等等。邦达列夫也颇为得意地声称，小说中有他“用了四年多之久才揭示的秘密”。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小说《岸》的“现代性”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显得十分重要而有价值”？进而也就能知道邦达列夫的秘密何在。

负有特殊使命的“东方的明星”、苏修作家尼基金和他的朋友萨姆索诺夫一到西德汉堡，就急不可耐地到书店、隐秘酒吧间、阵亡将士纪念碑等场所乱窜。他们为什么如此性急？据说是因为他们还“不太了解现代的西德”，用尼基金的话说，就是“这些西德人是些什么人，对我来说，基本上毫无所知，没有探讨过，是个空白点”，因此样样都要认真“领略领略”，处处“都该了解了解”。他们看到的是，汉堡上空“阴霾满布”、“烟雨迷蒙”，到处是“黑洞洞”“阴森森”的，人们射出威胁性的目光，随时都可能发生“毒打、抢劫，甚至可能谋杀”。他们感到烦恼的是，这里至今尚未摆脱战争造成的民族怨恨和冷战带来的东西方“不信任感”，甚至连卖笑的酒吧间女郎也认为“俄国人都是间谍”，对俄国人充满敌意。因此他们了解到，无论

从政治、思想、文化到生活方式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西德的影响还是个“空白点”。尼基金此次西德之行，和他多次到欧洲其它一些国家一样，就是要来填补苏修的“空白点”，就是要利用“友好对话”向西方渗透，输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在西德逗留的短短几天中，他一会儿出现在家庭聚会上，一会儿出现在公开讲坛上，一会儿出现在夜总会里，进行他那“东西方对话”，同西方知识界的代表进行“当代的主要哲学论战”。他积极推销什么“革命就是否定不道德、肯定道德”，“社会主义，这是人对最大自由的理解”，“人与人之间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等反马列主义的谬论，利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借别人之口咒骂“战争——这是臭狗屎”，竭力在西欧人民心目中制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厌恶战争、反对战争的假象，麻痹西欧人民。不仅如此，尼基金还利用一切机会，尽情观光西方黄色电影、妓院、酒吧间、夜总会等污秽不堪的地方。他看到美国的思想文化在这里充斥泛滥，美国的生活方式成了西德的楷模。作者如此津津有味地描绘西方腐化堕落的生活，无非是借此证明，西德以美国为榜样，其结果何等堕落，何等不道德啊！可是，谁不知道，克里姆林宫的权贵们早已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他们荒淫无度的生活使西方的资本家也望尘莫及。尼基金偏要表明苏联社会才是文明道德的典范，从而否定西方的不道德，要以苏联的“文明”“道德”来取而代之，其实质正是觊觎美国在西欧的势力范围，妄图把“快沦为美国在欧洲的一个州”的西德变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从而霸占全欧、全世界。这里用得着勃列日涅夫在二十五大上的自供：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活

动非常广泛，形式多样。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这才是尼基金到西德这个“空白点”来的真正目的。

为了达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目的，邦达列夫在小说中把主人公尼基金打扮成一个“探索真理者”，利用这个“探索真理者”的幌子大耍花招。

花招之一，就是以社会帝国主义牌号的“国际主义”反对西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扩张侵略的所谓“民族主义”。于是尼基金在“东西方对话”中，为西德人民指出走向“幸福彼岸”的“正确途径”，即用“武装善来反对恶”，捣毁“民族主义”这座“无耻之辈的藏身所”，拆除对苏联“敌视和疏远的栅栏”。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既然胡说什么“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任何企图把自己的民族利益放在首位，闭关自守和与外界隔绝的做法，必然会使主权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必然会导致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小说的作者就借西德酒店老板之口宣布“不承认什么民族差别”，“没有德国人和犹太人之分，也没有俄国人和美国人之分，大伙儿都是兄弟”。在苏修看来，谁不接受勃列日涅夫主义，谁不同他这个天然盟友结盟，而是要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谁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无耻之辈，就是丑恶的民族主义。革命导师恩格斯早就深刻指出：“如果属于统治民族的国际会员号召被征服的和继续受压迫的民族忘掉自己的民族性和处境，‘抛开民族分歧’等等，这就不是国际主义，而只不过宣扬向压迫屈服，是企图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征服者的统治辩护，并使这种统治永世长存。”^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明明是压迫剥削奴役其

他民族的罪魁祸首，但小说的作者邦达列夫却要被压迫民族忘掉自己的民族性和处境，拆掉对社会帝国主义极不信任的“栅栏”，这不是企图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自己征服其他民族的罪行辩护，并使这种统治永世长存又是什么呢？

邦达列夫担心空洞的说教不能欺骗西德人民，于是又在小说中耍出第二个花招，树立一个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救世主，甘愿出卖祖国、民族乃至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的西德妇女爱玛·赫伯特太太的形象。作者精心设计了尼基金救爱玛这一重要情节，并以此为主线，贯穿小说的始终。应当指出，尼基金与爱玛的关系并不是个人的行为。他们一个是作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代表，另一个则是作为西德人民、欧洲人民的化身来描写的。尼基金坐着飞机到西德去，是以“救世主”、“解放者”的身份去探望“被救者”、“被解放者”的，也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这种“友谊”“合作”而去的。苏修头子厚颜无耻地宣称：“我们的军队把欧洲各族人民从希特勒主义中拯救出来，解放了他们，也拯救和解放了德国人民。”而作者就在“救”字上大做文章，浓墨重笔地刻划了爱玛这个西德人民叛徒的“得救”、“怀旧”、“呼救”的丑恶形象。看，当年爱玛出于对自己的“解放者”“救世主”的感恩戴德，二十六年来，一直沉湎于“怀旧”之中，不仅一直怀念他，而且更爱上了俄国，念念不忘尼基金当年教给她的俄语，甚至还梳起了俄罗斯式样的发髻来欢迎这位“救命恩人”重访西德；还是这个爱玛，在尼基金这个“和平天使”的说教下，对苏联的“人道主义精神”崇拜得五体

① 恩格斯：《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四五六页）。

投地，竟然赤裸裸地向苏联“呼救”：“只要俄国中尉回来，哪怕再打仗，再开枪，再被强奸都行……只要他到柯尼斯多夫来，开着大炮到汉堡来。”苏修评论界极力鼓吹爱玛的形象“在小说思想哲学主题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用意也正是在这里。邦达列夫着意刻划爱玛这个西德人民叛徒的形象，无非是想借这个活标本，要西德、欧洲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向爱玛学习，永远不忘苏联这个“救世主”的“恩情”，欢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开着飞机、大炮、坦克、军舰，带着核武器来开发西欧和世界上所有的“空白点”。

邦达列夫的花招之三是，竭力渲染所谓“幸福的彼岸”。作为这一“幸福的彼岸”的主要象征之一就是富有“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克尼亚日科和尼基金。而克尼亚日科更是作为这方面的理想人物精心塑造的。在反法西斯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克尼亚日科出于莫名其妙的信任和同情，以军衔和脑袋担保，释放了爱玛及其参加法西斯反动组织“狼人”的弟弟库尔特；当他听到负隅顽抗的法西斯匪徒在红军炮火的反击下发出可怕的野兽般的嚎叫声，便痛苦得脸色发白，认为红军是“对着手无寸铁的人射击”，急忙下令严禁开枪开炮；为了挽救德国人的死亡，他只身穿过空旷的草地，挥动手帕，去劝说法西斯暴徒投降，结果被法西斯的子弹送了命。在邦达列夫笔下，克尼亚日科简直成了最富有人性的善的化身，如果大家都像克尼亚日科那样同情和信任一切人，爱一切人，甚至爱自己的敌人，世界上岂不就没有矛盾和冲突，更不会有战争了，那不就会出现一个“绿色的天国般的幸福彼岸”了吗？不难看出，这个“幸福的彼岸”实际上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建立称霸世界

的“彼岸”。无怪乎，苏修评论界要把克尼亚日科说成是“理想的英雄”，“建立了人性的功勋”。原来他可以被用来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达到称霸世界的“幸福的理想彼岸”服务。

够了，撕下尼基金“探索真理”的假面，露出的就是勃列日涅夫主义那一套，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搞假缓和真称霸的战略方针。小说名为《岸》，就是企图向西德和世界人民指出一条驶向那“绿色的天国般的幸福彼岸”的航线，但在这条航线上要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霸主掌舵，通过同它“加强信任、友谊、合作”的“缓和”的过程，最后让苏修来填满所有的“空白点”，这样，天国彼岸就近了。

为鼓吹这个“幸福彼岸”，尼基金不愧是克里姆林宫的得力走卒。比起萨姆索诺夫来，他的政治嗅觉要灵敏得多。他懂得，十年前东西方不可能交谈，正是勃列日涅夫才开始了新“路标”。比起只知道用硬的一手来征服西方的萨姆索诺夫来，他更懂得施展刽子手和牧师的职能，因此在耍弄缓和骗局上也更为高明和卖劲，以致最后竟心力交瘁死去。作者就这样把尼基金这个生活上腐化堕落、政治上反动透顶的修正主义文人美化成为探索真理而献身的英雄。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勃列日涅夫集团需要尼基金这样的推行假缓和真争霸的英雄，以此蒙骗群众，克服内外交困的窘境。在这一点上，尼基金可说就是邦达列夫的化身，尼基金的经历也就是邦达列夫走过的道路。尼基金作为修正主义的英雄人物，为假缓和、真争霸死去了，邦达列夫则以此表明他效忠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决心。他作为勃列日涅夫的御用文人继续在国内外舞台上表演着。身为苏修作协书记、俄罗斯联邦作协副主

席的邦达列夫是自觉为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效劳的。小说里尼基金曾对迪茨曼这样说：“您想象中的作家的工作又会是怎样的呢？是根据克里姆林宫电话的命令写的吗？……”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白，正是邦达列夫作为克里姆林宫精神警察的绝妙自供。

但是，无论是尼基金的花言巧语，还是邦达列夫的种种花招，都无法掩饰苏修的缓和骗局。如果说过去只是一部分有识之士察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缓和骗局的话，现在，世界革命人民已从无数事实中看清了北极熊的圈套，识破“缓和是莫斯科的特洛伊木马”。当前世界上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内外交困，成了众矢之的。邦达列夫慌忙筑起这条“希望之岸”，妄图苟延残喘。可惜，他的岸越长，岸基就越空，漏洞就越大，是无法挡住奔腾向前的革命洪流的。而勃列日涅夫之流连同他们所谓的“缓和”“和平”“合作”的空中楼阁，也必将被震天撼地的革命狂飚席卷而去，他们永远也到达不了那个“绿色的天国般的幸福彼岸”，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另一个历史彼岸——尼基金已去的地方——死亡。

南京部队炮兵 叶 斌 识 金

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

第 一 部

到 彼 岸

第 一 章

一架巨型飞机的喷气发动机在九千公尺的高空轰鸣。就是在这里，在舷窗厚玻璃外，在阳光普照的北极的严寒中，令人目眩的、白糖般的巨大的冰山闪耀着，沿着地平线飘浮着。在它们下面，在被密密层层冰云覆盖着的白茫茫的深处，留下了好象被遗弃的大地。

在穹苍下微微振动的连续飞行中，虽然意识到云层之下是可怕的深渊，但是，由于阳光的照射，由于在机场久待后终于开始了顺利的飞行，温暖的座舱里变得活跃起来，使人感到舒适。直射的阳光显现出座舱里到处弥漫着层层烟雾，此刻的烟味特别好闻。乘客们解开拴着的安全带，把软椅靠背向后仰，坐得更舒服些；到处是翻阅报纸的沙沙声，这些报纸是由两个身段苗条、笑容妩媚的迷人的空中小姐（似乎是神话般地从国际航线时刻表的广告上走下来的）分发的；大家吮着起飞时分发的夹心糖，这也是空中小姐几分钟前带着迷人的微笑放在托盘上送来的；接着，座舱的各个角落响起了俄语和德语的说话声——笼罩着普遍的旅途舒适、平安无事的安逸之感，希望以后的一切都象刚才那样顺利和安逸。

摆脱了一切家常琐事的自由自在的感觉，最初是在机场上产生的。现在，在飞机里，在舷窗外一望无际的充满阳光的高空中，在功率强大的发动机震耳欲聋的吼声中，在耳畔听到的外国话声中，在令人愉快的天堂般的座舱里，由于长腿的空中小姐——这些在空中维护精神安宁的纯洁天使——的亲切

微笑，更富有宗教的神圣色彩，令人感到有如释去枷锁，悠然自得。这种不以飞行为苦事的感觉，对尼基金是熟悉的。他从侧面带着疑问看了一下萨姆索诺夫，他们从来没有一同乘过飞机。

萨姆索诺夫的圆鼓鼓的腹部还束着安全带，他带着好奇的眼光漫不经心地向过道那边的邻座转过头去。那里，三个上了年纪的，外表象是旅行者的德国女人，一边翻阅膝盖上的杂志，一边大声交谈，并用烟雾缭绕的香烟指指座舱前面空中小姐走进去的门帘。透过发动机的声音，尼基金听出“吃”、“早饭”^①这两个词。他想随便聊聊，就愉快地说：

“普拉托沙，别去听人家谈话。她们在谈什么？我想，一定是在谈此刻必不可少的早饭，对吗？要是能吃点冻鸡，喝点矿泉水倒也不坏！”

“德国女人饿得要死，”萨姆索诺夫叹了口气，回答说，“她们说，还是老早在‘大都会’饭店吃的早饭，不妨再吃点东西提提神。她们是科隆人，可爱的女人……只要一听到这种语言，我就会条件反射，简直象中了毒。战争期间我跟他们这种人谈够了——一辈子够受……”

“不，普拉托沙，喝点白兰地再吃冻鸡，这在飞机上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萨姆索诺夫松开安全带，摸索着按钮使椅背向后仰，笨拙地向后一靠，鼻子里呼哧了好一会，后来把宽颧骨的脸转向尼基金，疲倦的、好象圣像上的眼睛望着他，这双眼睛里没有通

① 此处原为德语。

常的那种讥讽，而是流露出忧郁的神情，迟疑着是否要研究研究尼基金开这句玩笑的原因。尼基金此刻好象是一语道出了一个无所用心的旅行者的这样的哲学。这个旅行者无忧无虑地半躺在椅子上，一心只想着冻鸡和矿泉水。

“我看得出，瓦吉姆，你对这次游历的开头很满意。是啊，总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你知道吗，我高兴的正是能同你一起到德国人那里去，普拉托沙。”尼基金说。

“彼此都是一样，”萨姆索诺夫含糊地低声说，“这种感情是有的。”

他们相识有十五、六年了。这些年来，他们走过的道路不少是交错在一起，甚至常常是联系起来的。两人写的书几乎也是同时出版。尽管风格是惊人地不同，——尼基金粗犷激越、热情奔放，萨姆索诺夫的散文则平稳细腻，这和他们两人的外部表现却又不可思议地截然不同，——一些评论文章谈到战后一代作家时，总是将他们相提并论。尽管他们俩都知道彼此在许多方面都不相同，但他们总是互相吸引着，这是因为这一代人都经历过战争，共同的体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还有在他们相识多年的交往中形成的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它有时隐藏在半开玩笑的讥讽中，甚至晚上打电话闲聊时也是这样，比如：“你神气起来啦，瓦吉姆？怎么电话也不打来？躺躺沙发，抽抽香烟，坐享起荣誉来啦？什么时候你才能把中篇小说炮制出来，大作家？雇用黑奴了吗？读完了，读完了。你的那位教授写得还可以，渡口上那位细眼睛的姑娘也还可以，至于将军嘛，完全不能令人信服，你把他写得象个小知识

分子，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好吧，等着瞧吧，等我的大作告成，你们这种人就成了晚生后辈了。”“我不怀疑，普拉托沙，我在等着你那惊人的大作问世。”“等着瞧吧，尼基金，等着吧，你还会在我的书上落下伤心之泪呢。”萨姆索诺夫在电话里笑了，然后又背出一句简短有力、妙趣横生的俏皮话。“怎么样，嫉妒了吧？在扯头发了吧？就该这样写作，我的孩子。我三年才想出一个结尾。唉，你们这种人还是一群毛孩子呐！”

萨姆索诺夫写作起来慢得要命，一天只能写几行，写一段。他煞费苦心、疑疑惑惑地挤出几个字眼，然而又将信将疑。他讨厌修饰语，可是字句里又用了许许多多，甚至到了极为繁多的地步，但即使这样，文笔也还是细腻的，特别是作品结尾的章节尤为出色。然而，当有人向他提到文风有些累赘时，他往往一字一抠，使出牛劲来进行反驳，争得面红耳赤，脸色发紫，同出版社的编辑们吵得不可开交，因此有些批评家怕他大发雷霆，怕他会火冒三丈。有的认为他这个人爱大喊大嚷，令人难以理解，他会毫不客气地对写作界的同行进行粗暴的“骑兵式的袭击”，因为有时他偶然在俱乐部的走廊里遇见某个不够谨慎的批评家，他就会暴躁地冲着人家喊起来：

“你们这帮子苏格拉底，不见世面的真理爱好者，你们在喝酒的时候只会翻来覆去地唠叨一些叫人腻烦的定理吗？你们喜欢含含糊糊的电报文体吗？我可不是报务员。我写得太详细了吗？我以后还是这样！你们在这里嘟哝的那一套，我统统瞧不起，统统置之脑后！你们的时髦话和你们有月经的想法，害我得了消化不良。我温情地热爱你们和拥抱你们，我这就去药房买点蓖麻油来清清肠！”

萨姆索诺夫的这种顽固执拗激怒了许多人，为自己树敌不少，同时也招来许多崇拜者（尊重他的坚定），这种执拗尤其使尼基金接近他——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过去军界典型代表人物的性格和那时必须具备的充分自信。……在出了第一本书之后，尼基金已习惯了萨姆索诺夫对他的态度。萨姆索诺夫带着妒意和特有的偏见读他的作品，勉强夸奖几句，责骂着，好象不肯说出最后的评价。同时，那张胖乎乎的脸上激动得泛起红斑，镜片后面的眼睛变得湿润而忧郁，象患热病似的。在这种时刻，不知为什么尼基金便会想到：他的工作室是不舒适的，昏暗的，因为书橱占了很多地方，老式写字台上的墨水台笨重得出奇，桌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手稿啦、书啦、写满了又圆又小的字迹的纸张啦，纸上还可以看到咖啡杯留下的圆印，因为他工作时不停地喝咖啡。他还想到工作室角落里那张宽沙发床以及萨姆索诺夫坐在桌边和这张床上苦思冥想的情景。萨姆索诺夫精疲力竭地躺着，额头埋在枕头里，口中念念有词地搜寻辞句——有一天早晨，尼基金在他工作时间去他那里，见到他就是这副模样。

只要一想到萨姆索诺夫面对着一张白纸，搜索枯肠也找不到辞汇的痛苦，尼基金就会感到一种近乎羞惭的感觉——他也使自己在桌边坐上几小时，尽管要作无止境的修改，但他写起来比较轻松，比较快。因此，如果萨姆索诺夫的写作过程可以称为折磨人的苦役的话（他一天工作四小时），那他的工作就其持续性而言可算得上是加倍的苦役，但这对他来说仍然是一种乐趣。因此，每逢谈到萨姆索诺夫的著作时，在这种场合他总是特别委婉和半开玩笑地说，他承认写复杂句子的